

中译翻译文库·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

名家译论·妙趣天成·鸿儒论道·指点迷津

文化翻译论纲

(第二版)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2nd Edition)

刘宓庆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中译翻译文库·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

文化翻译论纲

(第二版)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2nd Edition)

刘宓庆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翻译论纲/刘宓庆著. —2版.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6.3
(中译翻译文库.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

ISBN 978-7-5001-4354-3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翻译理论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275号

出版发行/中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010) 68359827, 68359376 (发行部); 53601537 (编辑部)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book@ctph.com.cn

网 址/http://www.ctph.com.cn

责任编辑/胡晓凯

特约编辑/章婉凝 梁 斐

封面设计/潘 峰

排 版/竹页图文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70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20.5

版 次/2016年3月第二版

印 次/2016年3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4354-3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中译翻译文库·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中译翻译教材·翻译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

编 委 会

顾 问

黄友义（中国外文局）

主任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柴明颀（上海外国语大学）

方梦之（《上海翻译》）

郭建中（浙江大学）

刘和平（北京语言大学）

吕和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穆 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王恩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立弟（北京外国语大学）

许 钧（南京大学）

张高里（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陈宏薇（华中师范大学）

辜正坤（北京大学）

黄忠廉（黑龙江大学）

刘士聪（南开大学）

罗选民（清华大学）

谭载喜（香港浸会大学）

王继辉（北京大学）

吴 青（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晓荣（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仲伟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委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Andrew C. Dawrant（AIIC会员）

蔡新乐（南京大学）

陈 菁（厦门大学）

范守义（外交学院）

傅勇林（西南交通大学）

何其莘（中国人民大学）

黄振定（湖南师范大学）

Daniel Gile（AIIC会员）

陈 刚（浙江大学）

陈德鸿（香港岭南大学）

冯庆华（上海外国语大学）

郭著章（武汉大学）

胡开宝（上海交通大学）

贾文波（中南大学）

江 红 (AIIC会员)

柯 平 (南京大学)

李亚舒 (《中国科技翻译》)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

林大津 (福建师范大学)

刘宓庆 (同济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门顺德 (大连外国语学院)

潘志高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任 文 (四川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孙迎春 (山东大学)

王 宏 (苏州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 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闫素伟 (国际关系学院)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张美芳 (澳门大学)

郑海凌 (北京师范大学)

金圣华 (香港中文大学)

李均洋 (首都师范大学)

李正栓 (河北师范大学)

林超伦 (英国外交部)

林克难 (天津外国语学院)

刘树森 (北京大学)

梅德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秦潞山 (AIIC会员)

邵 炜 (AIIC会员)

宋亚菲 (广西大学)

陶丽霞 (四川外语学院)

王 宁 (清华大学)

王振华 (河南大学)

文 旭 (西南大学)

杨 柳 (南京大学)

张德禄 (山东大学、同济大学)

张其帆 (AIIC会员)

朱纯深 (香港城市大学)

特约编审 (以姓氏拼音为序)

高 伟 (四川外语学院)

王明树 (四川外语学院)

张 鹏 (四川外语学院)

李凌鸿 (重庆法语联盟)

杨全红 (四川外语学院)

祝朝伟 (四川外语学院)

项目策划

曹晓雅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本位 本分 本色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序

罗进德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第一版）自2005年起各卷陆续出版面世，作为这个项目的倡议者，应该对读者有所说明，也想借此机会同师友们交流一些感想。

刘宓庆其人其书，二十余年来已为我国翻译界所熟知，读者遍及大陆港台和海外，因此，为什么要出版这套全集，已经无须多加解释——这是许多朋友预料之中和期盼之中的事。这一项目的选题设想，也曾在资深专家论证会上受到充分的肯定。作为编辑出版中人，只想申说一点：出书应该着眼文化成果的积累，那么，就中国新时期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全局而言，刘先生作为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可视为代表性成果，应当是毋庸置疑的，普遍公认的。这套全集的出版，应该是我国翻译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翻译一事，若以一种社会学的眼光细看，其实也有“三态”：职场上的一项专业技能；大学课堂里的一门功课；学者案头的一个研究对象。与此对应，翻译工作者其实包括了三种人：翻译从业者、翻译教师、翻译理论家。不过在多数情况下，翻译理论家是由翻译教师兼任的，所以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可以看作同一个群体。有些人一身而三任焉——既从事相当规模的翻译实践，又当翻译课的老师，还研究翻译理论，三管齐下，是为全才。刘宓庆就是这样的全才，他当了五个整年头专职译员，真所谓“天天在翻译里打滚”。翻译界一直有人讥讽搞翻译理论的人“理论头头是道，笔下字字存疑”。这样的空头理论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多不多，至少刘宓庆绝对不是。当然，我所知道的许多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所建树的老师和朋友也不是。我以为，判断一位理论家的工作有没有价值，应该看他的理论工作对翻译实践（包括翻译实务、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业务策划、翻译学术出版等等）从业者的心智成长有没有帮助，因为这才是理论工作的职责所在。实践、教学、理论三手齐抓，三手皆硬的全才，固然值得钦佩，但是随着学

科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三方面之中在某一两个方面有所侧重,成就相对突出的专家,也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其实,对于理论和实践二者,要紧的并不在于哪个方面做得更多一点,贡献更大一点,而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是密切联系良性互动呢,还是分道扬镳自说自话,甚至互相鄙视呢?我以为,片面强调理论而轻视实践,跟片面强调实践而轻视理论一样,二者都属于非理性认识。不幸的是,这种非理性状态并不少见。理论家和实践家之间不仅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明显差异,甚至还存在着某种情感障碍。这使我感到痛苦,所以想通过自己的工作多少消除那种非理性状态,缩小理论与实践、学术与行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这些年来,我一有机会就做一点,衔石填海,不觉老之已至。

首先是一套专业技能,是在知识密集基础上通过训练和实践形成的熟练技巧,不论是为了实现崇高理想,还是为了养家糊口,都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活跃的职业领域。因是之故,翻译必然是实践指向的,是注重应用的,是通过大量实际操作体现其价值并完善其品质的。脚踏实地不尚空谈,认真做好白纸黑字的翻译。这应该永远是学习翻译的人和从事翻译的人念兹在兹的第一要务。我个人以为,对翻译作理论的研究时,这一根本的立场也是不可以忘记的。刘宓庆一贯强调翻译的实践品格、翻译学的经验科学特性和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从一开始就提出并强调翻译的“技能意识”(Awareness of what is skillfulness),这是他的高明之处。把翻译定位为技能,绝非贬低翻译的价值,需知技通于艺,艺通于道。解牛的庖丁为何踌躇满志?因为他“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高贵的文惠君虽知夸奖庖丁的手艺,却没有达到庖丁的精神境界。勤奋地实践,加上精深地思考,会明白翻译非“小道”的道理,会得到庖丁那样的精神满足与升华,进乎巧矣。同时,技能意识也丝毫不会贬损翻译理论的学术价值,相反,我认为“技能意识”恰恰是翻译理论中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命题。谁也不必为抱有“技能意识”,为关注“怎样译”、“怎样巧译”而自惭形秽。据我看,“怎样译”和“怎样巧译”的问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因而不复存在也不值得研究的问题。近几年关于翻译质量下降的抱怨之声时有所闻,“怎样译”和“怎样巧译”的问题现在是不是更值得翻译理论家关注,并切实努力帮助解决呢?

但是另一方面,在翻译实务,翻译从业者的圈子里,对翻译理论的无知、误解和冷漠也的确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翻译有理论吗?”“翻译理论有用吗?”“我不懂什么翻译理论,不是照样儿干了一辈子翻译?!”恕我直言,这些话的确反映着某种认识上的误区,据我多年工作中的观察,有些翻译实践中发生的错误和缺陷,的确就是理论上的懵懂无知或错误认识引起的,只是人们没有、不能、或者不愿意用理论去分析罢了。不过说句公道话,对理论的认识误区,其存在确有历史的合理性。直到不久以前,翻译的技能并不是通过学校的课程系统传授的。



大学里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甚至研究生课程，创立翻译研究中心，建设翻译系科，以及“翻译学”名分的出现，这些都是相当晚近的事。就在不久前，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大学本科翻译专业，这一决策说明主管部门也已经认识到了：会外文不等于会翻译。可是在那之前，会外文就等于会翻译，外文干部就等于翻译干部。翻译似乎只是一种心领神会无师自通的本能，可以经过实践摸索出来的功夫，所谓“十年磨一剑”，“铁杵磨绣针”，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我们翻译界的许多老前辈，甚至来不及读到大学毕业就因救亡、革命或建设的紧迫需要提前挑上翻译的担子，有的甚至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在极其复杂危险的环境中，连字典也没有几本，硬是凭着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毅力，在工作实践中刻苦钻研，逐步提高成长，并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这种炮火硝烟中磨剑的经历和毅力，实在是极可宝贵，极其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多少人幻想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不惜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今天，前辈们一步一个脚印刻苦钻研的精神尤其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但是，若要请教这些老前辈如何才能做好翻译，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回答却往往让人感到不得要领：“外文好加上中文好，自然翻得好。不要讲甚么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也不用讲，翻就是了。”如果请他们评论译作，好的就是“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不好的就是“胡翻乱译”，这样的翻译经验谈虽然也在理，却没有“说到点子上”，所谓不具有“认知价值”，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还有的实践家以“一辈子不看理论书”自夸，若请他们评说理论著作的得失，如何保证判断的准确？

人类的经验和知识是要经过富集、提炼和梳理，才能一代一代往下传承的；社会的进步需要高效率、成批量地培养高水平的专门人才。这就要办教育，要开设专业课程，要为人师者去传道授业解惑，这些事情，没有理论的升华如何做得？就是老前辈带徒弟，要想徒弟能举一反三，恐怕光告诉他“Follow me”也不行，要让徒弟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就得讲出些道理（也就是规律）来才行。否则的话，翻译岂不成了一片非理性、不可知的神秘天地？

在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翻译行业的实务、翻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翻译理论关注的热点都在发展变化。比如，翻译的应用研究、非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翻译服务行业的组织管理问题等等，都在从职场渐次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并产生着创新性的成果。较之以古典文学为主轴的传统翻译理论，一些优秀新作富有生气，更加贴近翻译的现实。生活气息浓厚的时代感、现场感，加上机敏的理论思考，一扫沉闷乏味的老生常谈和不知所云的食洋不化，带来一股清新风气。中国的翻译实践是一座宏大丰富却没有充分开发的矿藏，只要翻译实践中的人们走出“翻译无理论”的认识误区，开动理论思维，找到适宜的研究方法，善用切合实际的理论工具，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创新性成果一定会层出不穷、精彩纷呈

呈。从实践中提炼，又到实践中丰富、检验和修正，并指导实践，求得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是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科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但是，几年来，反对翻译理论研究为提高翻译实践水平服务的声音，主张译学研究跟翻译实践分道扬镳各自精彩的声音不断传来，使我这个一直为“翻译理论有用”辩护的人不禁陷入深深的迷茫和困惑。社会上关于翻译质量滑坡的抱怨如果确有事实根据，那就确实有点儿“吊诡”——新时期以来，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教学一派繁荣昌盛，成果累累，可翻译质量却“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学本科翻译专业纷纷开设，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保证培养出合格的翻译人才这个问题，已经极现实、极迫切地提到我们的面前。

回顾二十余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走过的路程，确实是在不断的争议中前进的。翻译有没有理论？翻译理论有没有用？翻译学这门学科的名分能不能成立？中国的翻译学应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应不应该为翻译实践服务？如何对待外国的翻译理论？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一直处于分歧和争论之中，其核心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刘宓庆这些年虽然大部分时间讲学、研究于两岸三地，远涉欧美，却并没有片刻放弃对这些关乎译学大是大非问题的现实关怀，他没有“失语”，没有动摇自己的学术立场，有时甚至因观点的不同而招致批判或攻击。这些故事，在《全集》中大多可以读得到，无须赘述。刘宓庆关于中国翻译学应否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他所说的具有“中国价值”，以及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中西译论关系的问题，尤有个性鲜明的论述，且二十年来一直在不断丰富和成熟之中。他的治学历程颇有启示价值，读一读他为《全集》撰写的自序“四十年学术人生”和全集之十《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卷首的自序“翻译十答”、在第二版中更有“新‘翻译答问’”便可见一斑。这些文字所反映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也是他译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他实际上是要想用治史的路数研究翻译理论中某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些文字是值得一看的。但是我还想着重推荐两点：

第一点，在本体论层面，刘宓庆把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作为“文化战略”看待。如果我们承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文化的多元性确实面临威胁和挑战；如果我们承认在人文社科领域，包括译学领域，确实有西方学术霸权的幽灵在游荡，那就不能不承认：刘宓庆强调“文化战略观”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出自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我个人以为，刘宓庆的“文化战略翻译观”是他对中国翻译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是一个有待展开和深入的课题，甚或有助于医治我们某些幼稚病。幼稚病之一，我看是对所谓“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对“解构论”的盲目追捧。对于“解构论的翻译理论”，郭建中教授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2000）一书中早有中肯的批评，指出它“对翻译实践来说，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详见该书第187页）要知道，翻译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是以意义为主轴的，而解构论



恰恰要釜底抽薪、颠覆意义！任何思潮、理论、学说、口号的出现必定有其社会、历史、心理的原因，必定同所在的国家、民族、文化和学术传统有关。在甲语境能言之成理征服人心的，到了乙语境却未必可信可行。可是我们却轻言“普遍价值”，要么就轻言否弃传统，跟在洋人后面说中国没有哲学、没有逻辑、没有“理”只有“术”，即便有也不成样子，不屑一顾。这是不是幼稚呢？又比如所谓“文化转向”问题。从文化视角来看待翻译，在中国始于道安（314—385）的“五失本，三不译”论和鸠摩罗什（344—413）可谓世界翻译史上最早提出的“译文操控论”（即所谓“新译”主张）。在近代，林语堂、傅东华、徐志摩、鲁迅也很早就把文化社会关照和文化审美观照引进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之，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密切挂钩，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比外国人晚。方梦之教授说：“早在1982年我国就有人以《翻译与文化》为题发表文章。（罗按：比如《翻译通讯》有外交学院已故院长刘山先生的《翻译与文化》发表）王佐良先生早在1984年也就这一主题连续发表论文，不过侧重点不一样，我国开始主要强调思维方式、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方面。可惜‘家花没有野花香，外来和尚好念经’。我国翻译史上的翻译文化研究并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直到外面有了‘cultural turn’，这才‘如梦初醒’，喔，原来还有个‘文化转向’。”（《上海翻译》，2006年第1期）是我们不善于做理论概括，不善于创造新名词呢？还是我们两眼只知道往外边看，瞧不见自己家里也有好东西呢？我们有时谈起中国事情，显得有点轻飘。有的说严复从英国回来“仅一年过后”就翻译出版了《天演论》；有的竟断言“信达雅三难说”不是严复原创，而是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改头换面，论据是“严复到英国留过学，不会不知道这个大名人”。诸如此类的扬西抑中论不一而足。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是不是应该多一点谦恭和尊重？事关我们的文化血脉和文化身份，我们的文化的发展，我期待刘宓庆提出的“文化战略翻译观”受到认真对待，并期待就此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我愿从中多多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

第二点，在方法论层面，刘宓庆提出“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治学方法。依我肤浅的理解，这“本位/外位”范畴是有广阔外延的：包括中国与外国，翻译与相邻学科，等等。有识之士已经发现，翻译理论的内容越来越“驳杂”。据我的愚见，这恐怕是“本位迷失”造成的。而“本位迷失”又恐怕跟对“跨学科研究”的误解有些关系。翻译的理论离不开跨学科研究，文艺美学、文学批评、语言学、交际理论、符号学、语篇理论等等学科的介入，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好处人人知道，毋庸置疑。但是跨学科有“跨入”与“跨出”之分。上面提到的几个相邻学科，它们跟翻译的关系是“跨入”，是请进来帮助我们研究翻译的，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无疑属于拓展翻译研究的范围，是被翻译学融合的组成部分。另外有些跨学科现象，则是从翻译跨出去，利用翻译中的事实、现象和体验去研究论证、彰扬别的

学科里面的事情。这种研究方法当然也很好，研究的成果也颇有趣味，但是这种研究的对象已经不是翻译，翻译只是个“票友”，主体已是别的什么东西了。至于解构主义谈翻译，那不过是欲借“翻译票友”酒杯中的余浆浇灭后现代之块垒中的残焰而已！那么，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其适当的位置应该在何处？任何理论学说或学派都要有自己明确的对象，有自己明确的任务目标，有自己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和范畴概念术语体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逻辑基础，因此也就有它自己的范围界限。概念混淆、界线不清，导致了一种怪论——有一种跟翻译实践毫无瓜葛的“翻译理论”，据说那才是“高端的、纯粹的学问”。为了能立足本土参照外洋自主创新，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们是不是该做些选择、鉴别、扬弃和梳理的工作了？是不是该清理盘点一下我们的理论行囊了？如果要做这样的工作，“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论原则。方梦之教授最近提出：“翻译研究应该回归本体，特别是回归到文本和翻译主体。不管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也好，还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好，都要在译学的本体扎根，才能生发出新的东西，使译学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上海翻译》，2006年第1期）方教授和刘教授二位正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举双手拥护！

最后想说的是，我个人对刘宓庆教授的译学著述，在总体上十分钦佩，多年来拜读他的作品受益匪浅，因此倡议编辑出版经过修订的《全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个人看不到他某些局部和细节上“不敢苟同”之处。在这里我不想重复那句套话——“瑕不掩瑜”。好在作者自己是谦虚大度以学术为重的人，他经常提到“我罪我知”，“谦者求全，虚者求进”。这次为编辑全集他就把能搜集到的所有对他提出批评和商榷的文章都收集起来，悉心研究，以便对他的工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判，取其精华，裨便第二版提升、改进。我注意到，他的好几本书业已修订改版，我想就是他着力于精益求精的表现。我也希望《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第二版的出版成为一个新的契机，让广大的读者——特别是熟知《全集》第一版的海内外翻译学莘莘学子和业界众多专家学者——都来参与探究、参证、评论乃至批判，如果能就此掀起一场新的讨论就更好，因为这肯定有益于中国翻译学的完善和健全，有益于提升中国的翻译理论在国际上的理论话语权，也肯定能帮助刘宓庆教授本人的学术工作更上一层楼。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刘宓庆和他的著作，作为新时代中国翻译学术整体性整合研究的代表之一，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2006年7月

2015年9月修订

说到底，我这一生的翻译研究集中于三个核心课题：翻译与语言哲学、翻译美学以及文化翻译。这三个课题加在一起大概花去了我生命中的近四十个年头。我研究语言哲学是为了提升对翻译的认知（主要集中于意义问题），研究美学是为了通晓翻译的审美表现（主要集中于语言审美），而研究文化则纯粹是为了为自己铸造和维护一个我万分珍视的文化自我（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当下诠释和构建），使我不论奋斗在什么困顿迷茫的学术生态环境中，都能领略徐志摩所说的那一杯“人生甘露”和保持一腔通常被西方人称为“中国士人”（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的“忧患意识”和“生之热忱”（passion for life）。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说过一句话：“Culture is the passion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and what is more, the passion for making them prevail.”（“文化是人对甜美和光明的憧憬，重要的是，要使这种憧憬超越一切。” Preface, *Literature and Dogma*, 1873）从《文化与翻译》初稿（1988）到《文化翻译论纲》成书（1998），在断断续续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我常常想起阿诺德这句话。我相信，失败我很可能遭遇，但“憧憬之梦”我是永远不会了断的，即便我这一生还看不到那一幅阿诺德所说的“甜美”和“光明”的远景。

——2015年第二版题记

（摘自2011年1月18日答台湾友人书）

这本书写于1988年初至1998年底，历时整整十年。这期间三易其名，四易其稿，并为此赴大陆荆楚腹地和都柏林大学及爱尔兰各地考察。在我所有的著述中，这本书让我付出的辛劳最多、使我获得的人生感悟也最多：所谓“十年磨一剑”，实非夸张。我只盼中国译论的后来者磨出一把又一把更锋利的剑来。

——2002年3月第一版题记

本书体例说明

一、本书第一版原名《文化翻译论纲》，原本只立意于提出翻译文化研究的**整体理论架构**，并略加阐释，以说明作者主要的理论观点，勾绘出基本理论框架。第二版又新添了很多内容，犹如滚雪球，论述上虽力求突出重点，但已谈不上“简约”了，不符合论纲体式；现仍沿用原名，主要是考虑到读者已很熟悉，不如从旧。

二、虽然如此，本书并未对任何一个论题作全面、翔实的论证；有些论题作者仍在思考中，有些属于更深层的范畴（如思维方式与风格的民族文化特征、思维方式与审美表现方法论，等等），其中有些课题业已收入作者关于翻译美学的著作中，敬请参阅。

三、对许多作者认为有必要加以解释的问题（包括某些基本概念），本书采取了“以注补释”的方法，以佐阐述，或提供背景资料供读者参考、研究，附于章后。

四、文化问题非常复杂，中外论者各师各法，所用术语有些也大相径庭。本书中的引文大都取自原著、原文，意在让原作者“自话自说”，并通常引入整个有关语段，以求准确理解原著作家的观点，避免断章取义；有的则有大意提示，不拘一格。除难度较大的原文有译文或提要附后外，有些原文引证，没有汉语对照，意在激发、提高读者**阅读、深研原著**的兴趣和理解力，也便于读者判断鉴识，查对原件的意旨和情态，以佐实证，避免先入为主，以讹传讹。

五、文化翻译可能是翻译实务中最棘手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文化翻译理论也是 21 世纪翻译理论研究中**最棘手、最有争议**的问题，它的路向、研究范畴、研究方法都已引起各方关注。**文化价值观论**则是这个领域中最深层的理论命题，对此，本书作者已将新近的研究写成序文，见第二版卷首，但意犹未尽，抛砖引玉而已，欢迎读者参与讨论。

文化翻译中的价值观研究

(第二版序文)

刘宓庆

价值论 (Axiology) 属于哲学课题,“价值哲学”是首先由法国哲学家拉皮埃 (Paul Lapie, 1869-1927) 在《意志的逻辑》中提出的,经由德国哲学家哈特曼 (Eduard Hartmann, 1842-1906) 在《哲学体系纲要》中作了阐述。价值 (Value) 本身属于客体属性,这种属性能发挥某种投射到主体的作用或功效,并能满足主体的精神的或物质的诉求、需求。价值论则是主体对客体属性的主体评估鉴识和参证,因此价值论在欧洲哲学界也被视为“客体性的主体论”(Objectivity Subject to Subjectivity)。这种提法有道理,但似乎不太确切。实际上,价值是一个系统,可以分为认知价值、道德(伦理)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等等;使用价值、效用价值、应用价值、适用价值则被通称为“功能价值”。人的价值观属于思维—心理活动范畴。价值观实际上具有统摄认知、操控行为的功能,因此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研究课题。价值规范或价值标准通常是人们在选择、判断、评估事物时非常关注的基点(axiom)。在翻译文化研究中,价值观研究属于深层研究,这种研究指向对文化的深层理解,其目的在于促使我们摆脱对文本的浅尝辄止的文化现象学阐释,获得对文本的深层次文化理解,因此正是翻译学之所急所需。

一、翻译研究不能回避文化价值观问题

翻译是一种凭借语言转换的文化传播手段,犹如一座双向桥梁。既然是双向传播就涉及到双向选择,既然涉及到选择,就必然涉及到选择标准和选择价值。而且,要选择就必然要求有双向的理解,我们称之为“文化理解”。“文化理解”

是多维的,其中包括:①语义维度;②心理(重在情感、情操等感性)维度;③认知(重在知性)维度;④审美维度;⑤思维逻辑维度。以上五个维度,缺了哪一个都不可能说你理解了一个人,或是你理解了一个文本。可见,对翻译而言,文化理解是十分重要的基本课题。这个课题本书将在第四章展开了专论。

文化理解的基本条件是价值观的相通或认同,或曰“心照不宣”;文化误解的根源是价值观的疏离或相悖,或曰“格格不入”。不论哪种情况,文化价值观(对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都起着关键作用,对文化的深度理解,也就是对价值观的理解。撇开价值观来谈文化,只可能是些“表面文章”。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当今知名的西方文化论者中,除了克拉克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提到过“价值观”以外,竟然没有专业学者深入阐发过、甚至足够关注过文化研究中这个实在可以说是绝对不应该忽视的重要课题(Kroeber and Kluckhohn, 1952: 81; Keesing 1974: 79; Geddens, 1993: 31; Sewell, 1999: 39; Roberts et al, 2000: 50)。但无论从哪方面看,不论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多半反映在外译汉的选材、阐释及删节中),还是期待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多半反映在汉译外的选材、阐释及删节中),价值观研究应该是我们的文化翻译深层研究中一个不应该再忽视的问题。

(一) 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

目前中外文化翻译研究都流于肤浅、流于表面、流于直观。很多研究大抵在语言概念或物质文化层面、生活习俗层面、社会文化活动层面进行现象学阐述,有意或无意地将文化价值观这个核心问题撇在一边,因而对外语文化和本域文化都欠缺深度的文化理解。文化现象学更只是一步初阶,重要的是深入堂奥。

一般而言,价值观的重要性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价值观决定认知(Knowing is virtually subject to values)

人对事物的认识归根结底是由他的价值观操控的。英国作家菲兹杰拉德·布伦南(Fitzgerald Brenan, 1894-1987)在他的名著《旱季遐思》(Thoughts in the Dry Season)中说,“知识分子就是认为‘观念’比‘价值’更重要的人,那就是说,他们自己的观念比别人的价值更重要。”布伦南其实是在婉转地批评知识分子,不应将自己的观念凌驾于价值观之上;“观念”与“价值”相比较,更重要、更起作用的不是观念,而是价值。两个观念完全相通的物理学家或哲学家对某一具体的社会文化问题可能根本谈不拢,而两个观念完全相悖的学者对某一民族文化问题的看法却很可能完全相通。这就说明,价值观高于一般观点也高于专业观念。总之决定认知的是价值观,

而不是观念。人对“知”的追求总是受价值的驱动：观念可以点燃行动的火花，但动力必定来自支配观念的价值观，尤其是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中国上古夏商两代灭亡后，先民从“暴政亡国”中痛定思痛，创建了一段“殷鉴文化”（即以殷商之灭为借镜的“[周]文王维新[文化]”，侯外庐，2010:33），产生了体现殷鉴价值观的“五经”（《诗经》、《尚书》、《易经》、《春秋》、《礼记》），这是中华初始文明的灿烂之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处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各行各业包括几乎所有的工农商学兵和团体、政党都团结在全国抗战的旗帜下，最后取得了胜利。这都说明价值观认同的巨大凝聚力。

实际上，价值观决定人的一切基本认知。比如对科学原理和知识的认知就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价值认同的历史过程。在欧洲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 and Counter-Reformation, 1518–1659）以前，人类科学思想处在艰难的萌芽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教价值观和宇宙观，认定人的认知取决于“神谕”：早期中世纪（Early Middle Age, 400–1099）和晚期中世纪（Later Middle Age, 1100–1517）都不存在人文价值观和科学价值观的生存发展的土壤。伟大的转折发生在以1660年为起点至1788年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期间经过法国大革命（1789–1815）以及大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Liberalism, 1816–1869），终于达成了对科学原理和理性思维的价值认同。从1660年到1869年，一共209年，是西方文明现代化构建的关键期，其基本特点就是由价值观（包括人文人本价值和科学理性价值）决定认知。1870年到1913年西方逐渐转入帝国主义扩展期，价值观受到反人文、反科学和非理性思维的严重冲击，接着就是两次世界大战（1914–1945）的灾祸，把西方整得晕头转向。从战后到现在，西方可以说正处在价值观发展的自省期（Self-examination）。在金融危机一次又一次来袭的阴霾下，严肃的西方思想家再也不认为“后现代理论”的“调侃癖”（Sadonicism）、“偏激性”（Radicalism）和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Cynicalism）是他们应有的理性归宿了！与此同时，更有不少西方学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现在正处在“在迷惘中自省、在自省中又陷入迷惘”的困局中，正在苦苦寻找新的价值观。

第二，价值观决定选择和取舍（Selection is subject to values）

文化是个“金字塔结构”（Pyramidic Structure），它的基础是十分广阔而庞杂的物质文化层，而价值观则处在精神文化层，属于文化心理活动，处在统摄认知、操控行为的金字塔顶端，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个文化结构图：